

聊斋志异评析

任平先





2 032 6109 5

聊斋志异评析

任孚先

山东友谊书社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9/05

聊斋志异评析

任孚先

山东友谊书社 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120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50

书号 10099·1830 定价 1.05 元

目 录

《聊斋志异》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1
《聊斋志异》中劳动人民的艺术形象.....	22
《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形象.....	35
《聊斋志异》的妇女主题.....	51
《聊斋志异》的家庭伦理道德主题.....	66
《聊斋志异》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	78
《聊斋志异》的艺术结构.....	98
《聊斋志异》的典型环境创造.....	114
《聊斋志异》的意境美.....	130
《聊斋志异》的心理描绘.....	155
《聊斋志异》的艺术想象.....	157
《聊斋志异》的细节描绘.....	171
《聊斋志异》的民俗描写.....	180
后记.....	192

《聊斋志异》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是 《聊斋志异》的重要主题之一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借文艺作品“以泄愤懑，抒写愁思”的一部“孤愤之书。”而其中直抒胸臆，发心中之不平，浇胸中之块磊的，当推书中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一部分作品，这是由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出身、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蒲松龄出生在清初封建制度走向腐朽、没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新旧交替的时代。他的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攻读诗书，但却都际遇不佳。高祖是廪生，曾祖是庠生，而他的父亲蒲槃就更加不得意，“少慧，肯钻研，文傲陶、邓，而操童子业，苦不售。”最后不得不弃学从商。蒲松龄是熟读经史的饱学之士，聪颖过人，名冠乡里，但他在仕途的道路上，也并不比他的前辈幸运。虽然在早年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以后“入棘闱，辄见斥。”一直到他七十二岁高龄时，才得到一个岁贡。他的长孙蒲立德在《聊斋志异》的《跋》中有这样一段关于蒲松龄的文字：“幼有轶才，学识渊颖，而简潜落穆，超然远

俗，虽名宿宗工，乐交倾赏。然数奇，终身不遇。以穷诸生授举子业，潦倒于荒山僻隘之乡。”这种落拓的遭遇，使他过着与当时农民相近的贫苦生活，“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内外。出逢入者则避扉后，俟入之乃出。”（《元配刘儒人行实》）

由此可见，蒲松龄是一个终生困于闾场而郁郁不得志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的这种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中，使知识分子问题成为他的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蒲松龄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作家，如此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对知识分子倾注着如此浓重的感情，在如此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描绘出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我们从《聊斋志异》很多描绘知识分子的篇章中，看到了作者的心血和泪水，看到了作者在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经历和艰辛的脚印，看到了作者从切身体验中所熔铸的人物形象和富有哲理的主题。如《叶生》中主人公叶生的痛苦经历，读之使人不禁潸然泪下。他“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却久困名场，贫病交集而死，而他的魂却从知己丁乘鹤而去，专心培养丁乘鹤之子，以生平所拟举子业，番录教授，使丁子连战皆捷。叶生聊以自慰地说：“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这不正是蒲松龄设帐授徒，舌耕为生，并借以说明屡试不第，并非才智不足，实为“时数限人”的写照吗！他如《司文郎》、《考弊司》诸篇，也都明显的有作者的影子。

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的世界观和经历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到作品中。但我们同时要看到，文艺作品不是生活的实录，不是现实生活的自然主义的描摹，即便是作家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要描写对象，也是经过改造了的，典型化了的。那些取之于己的素材，一旦经过提炼制作，成为艺术作品，就不能把这类作品的艺术典型和作者本人等同起来了。蒲松龄在作品中所提出的知识分子问题和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已经远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和他个人生活经历，而是向着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探索，从生活的底蕴中挖掘提炼了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历史内容的问题。如《贾奉雉》，概括地描绘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贾奉雉的一生，塑造了一个由热衷仕途到心灰意冷、决心“出世”的知识分子典型。在他的血管里，无疑是流淌着蒲松龄的血液的。贾奉雉虽然屡试不第，但不愿去作迎合封建官僚们气味的文章，抱定“学者立言，贵乎不朽”的宗旨，不写违心之作，不干违心之事。非此，“虽登台阁，犹为贱也。”这正是蒲松龄本人立身处世的世界观的表露。他虽然锐志功名，但终生没有作出为统治者所欣赏的八股文，所以才屡困闱场。但贾奉雉毕竟不是蒲松龄，贾奉雉曾在郎秀才的劝说下，“戏于落卷中，集其葛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辍成文。”而竟然得中经魁。贾奉雉终究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无耻文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使他读着得中经魁的文章而汗流浹背，愤然潜入深山。不过，他仍对仕途留恋难舍，又重新回到家乡，经历了一番人世间的荣华梦，他在连

捷登进士第以后，出巡两浙，声名显赫。但因“为人鲠峭，不避权贵。”激起了朝中大僚们对他的不满，借其子孙们窃势横行乡里之事，对他进行报复打击，革职充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才顿悟：“十余年富贵，曾不如一梦之久。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最后跃入海中，飘然而去。从这里可以看出，《贾奉雉》所概括反映的生活是广阔的，通过贾奉雉从热衷功名到十年荣华梦的破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考场之弊端，世态之炎凉，官场之黑暗，生民之涂炭。通过贾奉雉生活道路上的几个起伏，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在封建时代正直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出路的。靠真才实学，是很难入仕的，而偶然有机会而幸中，如果不同流合污，也必然会到处碰壁，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贾奉雉的悲剧，是封建社会中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是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

高尔基在评论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指出：“托尔斯泰的文艺创作的基本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杂乱的俄罗斯生活中替这个良善的俄罗斯贵族少爷聂赫留多夫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换句话说，托尔斯泰伯爵要在生活中替托尔斯泰伯爵找个地位，因为聂赫留多夫、列文、伊尔琴耶夫、奥列宁——所有这些人物都是作者的自己的肖像，所有这些人物都是他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罢了。”（《俄罗斯文学史》第四八七页）这段话，对蒲松龄来说，也有某种恰合，蒲松龄的创作，是要在沉闷的封建社会里找到一个出气孔，是要在当时的社会里，为他和同他类似的知识分子找到一个位

置。他是以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为指导，近取之自身——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远取之他人——他所接触的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的遭遇，创作了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传世之作，塑造了他那个时代的各种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围绕科举制度展示 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始于隋，盛于唐，直到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覆灭而废止，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之久。其基本特点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对逐级考试中的得中者授之以不同的功名，最后到中央考试，取中者则授以官职。这个制度，和封建统治者制订的其他典章制度一样，是为其统治政权服务的，很为统治者所欣赏。唐太宗就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而且，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择优录取。就以盛唐时期来说，“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

（《唐摭言》）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官僚政治的腐败，而愈益暴露其弊端。就科举的内容来说，也愈益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把知识分子纳入统治者所规定的渠道，只尚文辞，不重实学，只准背诵经训，不准抒发自己的独到见解，只试八股、楷法，而且仅以朱注四书为依据。所以，科举制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当时先进思想家

们的激烈反对。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为白徒。”（《日知录·科举》）顾炎武等人对科举制度的激烈抨击，无疑是进步的，他看到了科举制度腐败黑暗的主导方面。今天，我们来评价科举制度，不应当仅限于对科举制度的激愤，仅限于对它的简单否定，在看到它的腐败黑暗的主导方面的同时，应看到它在当时所起到的、即便是很微小的好的作用，这就是不论如何，它毕竟为中下层知识分子从政开辟了一条虽然狭窄但却是唯一的道路。在锐志仕进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名利之徒，是企图通过科举登上高位者，但其中，特别是其中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不可能没有一部分有志之士。即以蒲松龄而论，他“五十犹不忘进取”，可以说是热衷功名的人，但从他的著作、世界观来考察，他并不仅仅把科举看成是个人的进身之阶，他是很有一番抱负的。他在与孙树百唱和诗中曾说：“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他是以郭汾阳自比，希望用自己的才学去报效国家民族的。他不仅熟悉“八股制艺”，而又有真才实学，他甚至懂得农桑之业，耕作之术。类似蒲松龄这样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在他所处的时代，应当说不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部分人中，大部分人抱定以文章立命的宗旨，不愿趋炎附势，贿赂当权者，不愿去作或者作不好那种为统治者所赏识的文章，所以久困名场，终生落拓，或在现实中没有出路而“出世”。这些人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其中有些人在和劳动群众的越来越多的接触中，成为

人民的盟友和代言者，他们不与统治者合污，保持了正直知识分子的高洁。同时，也不可否认，尽管统治者文网恢恢，仕途黑暗，使得中者“其八九为白徒”，但是，也不是毫无缝隙，毫无例外，八九之外总会还有一二的。由于某些考官的清廉、考生的博学（不仅通“八股制艺”，也精于其他学问。）等诸种因素，也有可能使一些，甚或是数量很少的品格端正、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得中，而获得了从政的机会，这些人应当说就是封建社会中清官的主要来源。

我们所以对科举制度作一些具体分析，是为了评价蒲松龄围绕科举制度所描绘的各类知识分子的形象。蒲松龄对那些热衷于功名富贵，企图以功名为进身阶梯的利蠹禄鬼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笔锋犀利，摘心挖胆，毫不容情；对那些闹场落拓的正直知识分子，则给予深切的同情；对于那些有幸得中的少数为民代言、为民请命的清官，则是加以赞扬的。蒲松龄在对知识分子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应当说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

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是充满着矛盾的。在他亲历闻战失败后，深刻体察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但同时，他又极希望“勋名上麟阁”，为自己不能如愿而悲叹：“良马非不骏，盐阪徒悲鸣，美玉非不贵，抱璞为世轻。”（《咏史》）但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他安贫乐命，而

不去趋炎附势。他以生动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考场的黑暗，这是作为文艺家的蒲松龄的现实主义的胜利。他确如鲁迅所说：“因为从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坟·写在坟后面》）他尖利的笔触，首先剖析了考试官的昏聩无能、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司文郎》中用瞽僧之口，对考试官大加讥讽：“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瞽僧可以用鼻子嗅出文章的优劣，他嗅余杭生的文章后，连连咳嗽：“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而这种嗅之令人作呕的文章，竟能领荐，原来在试官中就有余杭生的“恩师”。当瞽僧嗅到余杭生所投掷的考试官的文章时，“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在《于去恶》中，方子晋在考试时，七则题目已作了过半，忽然得知主考官的姓名后，便“裹具径出”，这是对主考官的强烈抗议，因为他知道这个考试官是不会主持公道的，考得再好，也是枉然，所以他才愤然退场。作者讽刺的笔锋，还直指冥司，勾画了冥司中主考官虚肚鬼王的丑恶嘴脸。只要到他的名下，不分青红皂白，必须先从股上割块肉给他，“此是旧例”，而只有“丰于贿者”，才得以幸免。闻人生目睹考弊司的鬼王对秀才“裸其股，割片肉，可骈三指许。”的惨状，不禁愤怒地喊出：“惨惨如此，成何世界！”蒲松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忽而人间，忽而冥司，对考试官进行无情的鞭挞，而其锋芒所向，则是人间，是借鬼骂

人，地狱中的虚肚鬼王，不过是人间“虚肚鬼王”的折光反映。“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表现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并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意义。”（高尔基《论文学》第113页）而这些“虚肚鬼王”式的主考官，原是那些闾场中的得志者，这些人“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数十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于去恶》）“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正是这些不仅没有眼睛也丧失了良心的胸无点墨的“得志诸公”，把持闾场，操生杀予夺之权。蒲松龄对这类知识分子是嗤之以鼻的，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蒲松龄对于那些混迹于闾场、利欲熏心的名利之徒，则作了辛辣的嘲讽和揶揄。《司文郎》中那个余杭生，在蒲松龄的笔下，毕现了骄矜而又无知的俗态。先是由宋生对他的文章作了总评：“有何难解，但不佳耳！”并且诵且誉，致使他丑态毕露，“跼蹐汗流，不言而去。”继而写瞽僧嗅其文章而恶心。宋生、瞽僧的态度，正代表了蒲松龄对余杭生式人物的态度。《王子安》中对禄蠹王子安的讽刺是入木三分的。王子安终日凝思苦想的就是如何登上高位，作威作福，在幻觉中出现了报马临门的盛况，不仅连中进士，而且殿试翰林。他为了出耀乡里，便大呼长班，当长班不中意时，就要进行惩罚，好不威风，但结果纯系幻觉，他仍是孑然一人，什么报马长班都是子虚乌有。其妻笑谑他说：“家中只有一媼，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

骨！”《续黄粱》虽不算蒲松龄的首创，是本沈既济的《枕中记》、沈西之的《秦梦记》及《樱桃青衣》数篇的推陈出新之作，思想意义更为深广，寄托着作者对禄蠹的深刻批判。曾孝廉梦中当了宰相，便鱼肉人民，侵人田产，掠人妻女，声色狗马，荒淫无度。结果恶贯满盈，受到报应，不仅在人世间受到严惩，而且到冥司也受到酷刑。一觉醒来，竟是一梦。曾孝廉梦中的经历，就是贪官污吏们的昭彰恶迹和应有的报应。这是对那些醉心于功名，企图以仕进达到盘剥、欺压人民的知识分子的绝好的揶揄和告诫。

当然，蒲松龄并不是对主考官和闱场得中的知识分子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他对提督山东学政的施愚山就非常敬重。《淄川县志》所载蒲松龄小传中就曾记述说蒲松龄“受知于施愚山先生”。《胭脂》中记述了施愚山担任山东学使时明断胭脂一案的吏治，不仅昏官们与他不能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以清官著称的吴南岱也比他略逊一筹。作品借冤主宿介之口赞扬施愚山“贤能称最，又有怜才恤世之德。”他对官运亨通的王渔洋也是颇为敬重的，对同邑进士孙树百也是赞佩的，否则他不会应孙树百之聘去当幕宾。在《聊斋志异》中，也有些篇目是描写正直的知识分子考场得中的。如《胡四娘》中，写尽世态之炎凉，四娘的丈夫程孝思因赤贫，寄于岳丈篱下，受到妻姊妹们的奚落，并被断定没有出头之日。二姊竟说：“程郎如作贵官，当挾我眸子去！”甚至三姊的婢女也不把程孝思放在眼里，说什么“二娘食言，我以两睛代之。”其轻蔑之态可见。但程孝思“默默不

较短长，研读甚苦。”后金榜题名，为官十余年，“历秩清显，凡遇乡党厄急，罔不极力。”作者显然对刻自振奋、致身青云，以扬眉吐气、为民代言的程孝思，赋予深厚的感情，加以热情歌颂的。《书痴》中的郎玉柱，受到邑宰史公的残酷迫害，而无处伸诉，无计可施。最后全赖锐志仕进，举进士，而且又做官于闽，才得以查明了宰邑史公的罪恶，对宰邑史公作了应有的惩处，使正义得以伸张。对蒲松龄的这些描绘，有些研究者归结为是作者出身和世界观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无可否认，蒲松龄是有其出身和时代的局限性的，但如果仅仅归结为他写了知识分子借进士及第以吐气，写了知识分子得中者的某些美德，如他们清明吏治等等，未免失之偏颇。如在前边所谈到的观点，我们应作具体分析，蒲松龄在以主要精力鞭挞和批判考场弊端、贪官污吏、知识分子之中的名利之徒的同时，描绘了有幸仕进的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这些人不与反动统治者同流合污，为人民作了些好事，这不仅是有现实依据的，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在严酷的封建社会里，人民除了铤而走险、进行武装反抗之外，往往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刚正不阿的官吏身上，而这些好官，应当说多数是通过科举得中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比较的能了解群众的疾苦，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民代言，为人民伸张正义。而那些王公贵族之胄，仕进前是纨绔子弟，仕进后为贪官污吏，他们是根本不可能代表人民的任何利益的。而中下层知识分子，诸如程孝思等人，在历尽凌辱和辛酸之后，借科举得中而扬眉吐气，也是在令人禁锢窒息

的封建社会中，找到喘息的空隙，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种情况，尽管在腐朽的科举制度下是寥若晨星的，但总归还是有的吧！否则，如何理解群众那样欢迎寒士及第后衣锦荣归、铲除恶霸得以吐气的戏曲和文学作品呢？当然，即便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在举仕后也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他们只能去补天，而不会也不可能去拆天，这是不言而喻的。

蒲松龄给予最大同情，饱蘸着辛酸的泪水所描绘的，还是那些品格端正、不务钻营之术的屡试不第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这部分知识分子，并非没有看到考场的弊端，但还没有挣脱功名利禄的绊羁；并非没有看到真正好的文章不会得到考官们的青睐，但他们以文章立命，宁肯落第，而不趋时；他们并非没有看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但他们却不去做那种鼠窃狗偷的事，而必然“久困名场”，“所如不偶”。“如今帘幕半心盲，呕出心肝听颠倒。”他们终生过着穷苦潦倒的生活。如《于去恶》中的于去恶、陶圣俞、方子晋，他们虽人鬼殊途，性格迥异，但落拓的境遇是相同的，为人正直、洁身自好是共同的。于去恶是个饱学之士，在人世间，一生贫贱，自期死后有好的运气，但事与愿违，仍郁郁不得志。在他的眼中，闱中试题“夫人而能之”，他的考试成绩“自谓场中无两”，但却落榜了，使他“闻言惊起，泫然流涕。”后因桓侯翼德巡视阴曹，裂碎地榜，选中于去恶，使他得以有出头之日。很明显，这种寄托是虚幻的。方子晋在闱场中“细审主司姓名”，就放弃了考试的

权利。与其被黜，不如径出，省得一番痛哭。陶圣俞也是命运淹蹇，屡试不第，使他灰志前程，隐居授弟。其他，如《叶生》中的叶生，《司文郎》中的王子平、宋生，《素秋》中的俞恂九、俞谨庵，都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总之，《聊斋志异》围绕科举制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深刻地揭露了那些场屋中贪赃枉法、不学无术的考官，但对那些为官清正的廉吏则并不排斥否定；他无情地嘲讽了那些胸无点墨、专务投机钻营之术的名蠢禄鬼，但并不否定那些有品格、有真才实学的考场幸运者；而他所歌颂的、给予深切同情的则是那些学识渊博、不趋炎附势，因而屡试不第、道路坎坷的知识分子。这是蒲松龄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当然，在这些作品中也表露了不少消极落后的东西，诸如“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因果报应等，这应当说是他的出身、经历和所处时代的局限，这是我们所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寄托着蒲松龄美学理想的人物

蒲松龄对热衷仕进但却正直的知识分子是深切同情的，这类知识分子实则是他个人思想、性格、经历的不同程度的写照。但这类知识分子并非蒲松龄所着力歌颂、寄托着美学理想的人物。蒲松龄虽然在青中年时期，热衷于功名，但经过一段痛苦的磨难，到他的晚年，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